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nti-War Ideas in the Sino-Japanese World War II Films “Purple Sun” and “Under the Flying Military Fla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st War Theory

Xin Liu¹ Gang Fang^{2*}

1.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College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Anhui, 230000, Anhui, China

2.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Anhui, 23000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anti-war idea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films about World War II.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wo films “Purple Sun” and “Under the Flying Flag”,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works in terms of human nature, victim experience, war responsibility and ideology in the context of war. Evaluating the moral justification and code of conduct of war in Sino-Japanese World War II films based on political philosopher Michael Walzer’s Just War Theory reveals how films criticize war, advocate for peace, and convey universal humanitarian values. These two widely influential films also represent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n the creation of anti-war films 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Keywords

Sino-Japanese anti-war films; just war theory; Human nature;

正义战争理论视角下中日二战电影《紫日》和《在飘扬的军旗下》中的反战思想比较研究

刘鑫¹ 方刚^{2*}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人文学院科技传播系, 中国·安徽合肥 230000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安徽合肥 230000

摘要

中国和日本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中的反战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通过对比分析《紫日》与《在飘扬的军旗下》两部电影, 阐释了两部作品中战争背景下的人性呈现、受害者体验、战争责任及意识形态等维度的异同。依据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的正义战争理论来评估中日二战电影中的道德正当性和战争行为准则, 揭示了电影是如何批评战争、倡导和平, 并传递普遍的人道主义价值的。这两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电影也代表了各自国家反战电影创作上的重要成就。

关键词

中日反战电影; 正义战争理论; 人性

1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反战电影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电影类型。这些电影探讨了战争的本质、战争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 以及战争背后的复杂政治和社会因素。但受地域特征、文化背景及战争定位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各个国家在反战题材电影中展现出的文化差异广泛存在于影片的各个层

面, 特别是在反战理念的表达方式上尤为显著。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中国电影《紫日》与日本电影《在飘扬的军旗下》两部作品, 从战争下的人性、战争受害、战争责任与意识形态多个维度深入探讨中日两国反战电影的异同。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所提出的正义战争理论为分析中日二战电影中的反战思想提供了一个结构化的伦理框架, 用来评估战争是否是正当的, 以及在战争期间应该如何行动才符合道德规范。

2 战争下的人性

人性通常意指作为人应有的正面、积极的道德品性。本性是普遍的而不是抽象的, 正是这种普遍的本性制约着它

【作者简介】刘鑫(1997-), 男, 中国河北唐山人, 在读硕士, 从事新闻与传播研究。

【通讯作者】方刚(1969-), 男, 中国安徽合肥人, 博士, 副教授, 从事电影研究、媒介文化研究。

们“选择”其生存或生活的方式。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国哲学家阿尔贝·施韦泽认为，“敬畏生命”的理念是统一世界、人生之肯定与善的理念。对于所有他者的“生命意志”应像对待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表现“敬畏”人类的伦理，仅在于一种认识，即植物、动物、人类乃至所有生命作为生命都是神圣的^[1]。但在战争期间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人们往往抛弃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展现出野蛮的一面，掩盖了人性中的善良。在《在飘扬的军旗下》这部作品中，导演通过军曹越智的回忆，描绘了二战最后阶段日本士兵在新几内亚荒岛上的悲惨遭遇。由于盟军的封锁和进攻，日军的补给线被切断，士兵们陷入了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的绝境，一些士兵甚至同类相食以求生存。也有其他一些日本电影如《野火》《那一天，我们奔赴战场》等日本作品揭示了士兵们被迫杀害受伤战友的事实。在这种极端的生存压力下，人性的阴暗面被无情地暴露出来。

中国电影《紫日》是通过杨玉福与秋叶子之间的故事，深刻地探讨了人性在战争中的考验与选择，杨玉福选择了宽恕而非报复这位被军国主义思想拉入深渊的女孩。这一决定经过了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它体现了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人性中的善良与光明依然能够战胜仇恨与暴力。当杨玉福丢掉匕首的那一刻，人性中最纯粹的光芒瞬间超越了民族间的仇恨，瓦解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施暴者与复仇者之间的对立界限。秋叶子在战争结束的希望时刻死在了本国士兵的枪下，秋叶子死亡的方式使影片战争反思抵达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战争扭曲并毁灭了人性的美好模样，这种破坏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国家或民族，而是影响全人类。

根据迈克尔·沃尔泽的正义战争理论所提及的非战斗人员的豁免问题，在真实的战争中，尽管个人的生命可能被简化为集体行动中的一个符号，但每个人都应被视为拥有不可剥夺的价值和尊严。沃尔泽强调，即使在战争这种极端环境下，也必须坚守道德原则，尤其是区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避免不必要的平民伤亡。而战争中的道德困境、价值观的矛盾、人性的异化，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每一个人的灵魂。这种双重性质使得通过战争题材影片进行反思和批判时，能够超越固有的意识形态局限，触及更深层次的人性问题，呼唤并促使人们对人性的本质进行重新思考。^[2]

3 战争中的伤害

对于战争伤害，沃尔泽特别指出，战争本质上是残酷的，战争的逻辑倾向于最大限度地使用暴力，而这往往会带来极大的人道灾难。中日反战电影中所表现的“战争伤害”因两国的立场和文化具有明显的差异，日本反战电影更多地从自身平民的角度讲述故事，侧重于“交战正义”，探讨战争中的道德界限。但有时会模糊战争起因，淡化日本作为侵略者的角色，影响了对开战正义的讨论。

由于侵略战争本身的非正义性质，日本反战电影中的

受害者更多来自本国的“压榨”，或者是日本本土和平民受到攻击，导演往往从反对军国主义的角度出发，创造新的叙事方式。电影《在飘扬的军旗下》则是通过多个角色的故事，深刻揭示了战争对底层士兵和平民的压迫以及对人性的摧残。影片中的富樫胜男的妻子先惠作为遗孀，不仅要面对失去亲人的悲痛，还要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这反映了战争对普通家庭造成的长期心理创伤和生活压力。同时，日本军国主义盛行，国家推崇武士道精神，强调军人的忠诚、勇敢和牺牲，认为这些都是最高尚的价值观。而先惠因为丈夫疑似成为逃兵，承受着巨大的耻辱感和社会压力。这种情况也从侧面揭示了日本全体人民一直饱受军国主义的迫害。上等士兵寺岛在极端环境下为了生存而背叛了自己的战友，参与了吃人肉的行为，并向上级告密导致战友被处决。战后，他深陷愧疚和自我自责之中，他对整洁时尚的城市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之后选择远离人群的垃圾站生活。这里揭示了战争环境下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同时也探讨了战后幸存者的心理创伤和自我救赎的可能性。陆军伍长秋叶在战后成为一名漫才演员，通过用舞台上戏谑的表演来掩盖或者淡化战争带来的痛苦，用台下观众的讽刺嘲笑来缓解自己的战后创伤应激障碍（PTSD），试图重新融入社会，展示了战争对个体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及人们在战后寻找心灵慰藉的方式。

沃尔泽认为，以对战争行为作出判断的，由行为准则、风俗习惯、职业法规、法律原理、宗教和哲学原则、互惠协议组成的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成为战争规约^[3]。侵略者违背了战争规约是中国反战电影的一个重要主题，创作者们往往通过描绘战争中的残酷场景、平民及弱势群体所遭受的苦难来传达一个信息，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几乎每一个人都成为受害者。《紫日》中的杨玉福这个角色可以被视为侵华战争中无数中国受害者的一个缩影。他原本是一个过着平静生活的普通农民，但战争打破了一切。他的家人被日军残忍杀害，自己也沦为战俘，被迫做苦工。作为集中营唯一幸存者，他目睹了日本士兵将活人装进口袋进行焚烧，将一批批的集中营俘虏枪杀，把他的母亲绑在柱子上，进行惨无人道的“活剥”，这些痛苦的经历通过面对日本女子秋叶子而不经意间回忆起来。更重要的是，杨玉福不让秋叶子碰枪和刺刀，在救陷入沼泽的秋叶子时产生被射杀的幻觉，提前把秋叶子偷的枪里的子弹退出来，这种警惕性也恰恰说明了这场战争中日本人对中国平民的伤害，是一种无法抹去的群体性PTSD。友军俄国士兵沙科夫、娜佳以及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的秋叶子也都是受害者。秋叶子的男友死在了日本战败后的自杀式袭击中，本可以跳伞求生的男友最终死在了己方长官的枪下。除此之外，得知投降的日本士兵开始剖腹、自相残杀并攻击己方平民，无论是死于愚忠的士兵，还是从小接受军国主义思想、接受着“杀死所有的敢于反抗日本的劣等民族”观念的秋叶子们，他们也是这场战争的受难者。

在战争中面临危险的是生命本身，人类本性被压迫至

最原始的形式，自我利益和生存必然决定一切。依据沃尔泽的正义战争理论，日本这场满足自己私利的战争明显不符合正义战争的标准。这场战争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人道灾难，也使日本自身陷入了道德沦丧的泥潭。对于受害者而言，两国人民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

4 战争后的问责

沃尔泽认为，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任何行为都构成侵略，是一种犯罪行为^[4]。若战争本身合法，则在战争中杀死战斗人员可视为正当行为。然而，一旦战争被判定为非法，任何形式的杀人行为都失去了合法性，等同于不法强盗团伙的谋杀，无法获得任何正当性辩护。

陆嘉宁在谈到中国学界和媒体对日本战争电影的认识和评价时指出：“因为文化的差异和两国集体记忆的巨大鸿沟，日本大概永远拍不出一部会令中国人民满意的‘谢罪’电影，这背后的因素和‘谢罪’问题一样复杂难解。”^[5]日本民众极少有人能够触及天皇的名誉，同样他们也很少承认军国主义的错误。而在《在飘扬的军旗下》的结尾部分遗孀先惠的一句台词：“国家擅自发动战争，付出代价的全是我们平民。”这句话深刻揭示了日本平民在战争中的无奈与悲怆，他们作为直接受害者，被迫承受国家决策带来的巨大灾难，不仅感到无力改变历史进程的深切无奈，更对政府擅自发动战争的行为充满了愤怒与失望，进而开始质疑战争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秋叶对着镜子自嘲：我本来活得好好的，可现在这只是人生的残渣，真正的我早已死在那里了！这也是从侧面质问这场战争的发动者对于士兵的伤害谁来负责？他通过漫才的方式来调侃日本惨败的战争，而台下的观众则隐喻着主动与无情侵略划清界限的日本导演和作家们，坐在旁观者的位置来批评和嘲笑它。军曹越智不忠的妻子隐喻着日本政府，而战后安置问题侧面证明了日本政府对战后士兵的背叛，导演通过这种方式来构建一个政府的虚伪形象。陆军少尉大桥忠彦也用嘲讽的语气批评日本政府的虚伪：现在连甲级战犯岸信介都当了首相，厚生省却因为一个人是不是逃兵调查了26年至今没有结果。富樫胜男等三人在被枪决的时候大喊“天皇陛下”，在寺岛看来并不是为了尽忠，反倒没有机会开口的咒骂，这无疑也是对天皇的问责。

现实生活中受害者可以问责裕仁天皇，而在电影中我们可以通过艺术方式问责军国主义思想。《紫日》中杨玉福在电影结尾部分质问秋叶子：你们凭什么到我们这里来杀人？他代表无数受害者发出疑问，质疑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理由。这种质问不仅仅是对个人行为的质疑，是对整个侵华战争合理性的根本否定，更是对整个侵华战争及其背后军国主义思想的强烈谴责。而对于日本来说，得知投降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却能打着为国尽忠的幌子去给平民洗脑，让他们去自杀，甚至肆无忌惮地杀戮本国平民。无论是士兵

和平民所受的迫害，都是出自军国主义分子的蛊惑。所以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的是军国主义，要反战就要消灭军国主义者、肃清军国主义思想。对于秋叶子来说，她是一个从小被军国主义思想洗脑但不彻底的日本女孩，军国主义观念和天真善良的人性在她身上反复拉扯，而每次她的洗脑教育发作的时候，杨玉福和娜佳都会用出于人性本能的善良行为重塑她的认知，来冲淡军国主义的影响。

政治领袖们必须论证他们使用武力的决策是正当的，否则就不能使用武力。裕仁天皇发动或未能阻止一场非正义战争的发生，也未有效约束日军在战争中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的行为，这构成了对他道德和历史责任的重要质疑。对于遭受了百年屈辱的中国来说，中华民族不会在侵略者还没开始真正反思的时候轻易选择原谅。像杨玉福一样，只有时刻抱着武器，才能保卫自己。只有彻底肃清军国主义分子，断绝军国主义思想，才能根治中国人的群体性 PTSD，才能还世界真正的和平，这也就是《紫日》想要表达的主题——中国式反战。

5 战争的意识形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的意识形态强调了扩张和统治，试图通过美化侵略来赢得国内支持。而中国则聚焦于团结和抵抗，旨在动员所有可得的力量对抗外敌。日本在二战期间拍摄了大量的“国策电影”，这些电影由宣传国策、美化侵略的电影公司制作，这些公司“执行政府的方针和政策，并导入政府的资金”^[6]。因此，日本战争时期的电影中经常充斥着侵略意识，为士兵塑造“好战”“敢战”“勇战”的影像，所谓的“爱国”也就成为个体的日本士兵心中的最大价值。而《在飘扬的军旗下》中的反战还在另一个角度诠释了日本士兵的死亡有什么价值。陆军少尉大桥忠彦思考日本这场荒谬且必定失败的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而他们这一代付出的青春和生命又是为了什么？只有死亡的人够多才能让渴望战争的高层们警醒，让那些狂人们降温悔悟，而那些战死的士兵就成为日本脱胎换骨的献祭品。一个国家的新生注定要在飘舞的军旗下堆起皑皑白骨组成的山丘。

一个国家发动正义战争应当基于这两个理由：第一个是集体自卫，第二个是保卫那些陷入极度痛苦中的、遭到大规模屠杀和奴役的人民。最终都是为了人权。电影《南京！南京！》所表现中国士兵和人民面对死亡齐喊“中国不会亡！”这句话表达了对正义的坚持，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中国人民也没有放弃希望。正如《紫日》中的秋叶子所代表的经历所示，日本人的所谓牺牲往往建立在对军国主义思想的盲目追随上，而不是基于理性的判断或真正的信仰自由。这些士兵可能并非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被灌输了特定的价值观，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愚忠”，这导致他们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即使这意味着牺牲个人的生命。正如得知战败投降的日本军官把饮弹自尽、切腹自杀当作是他们尽忠天皇的方式和

自己生命的所谓价值。当一个日本人比如电影中的秋叶子不再推卸战争责任，敢于在她的同胞面前戳破军国主义谎言的时候，她才可以被原谅。用真正的行为去反战，也许就是秋叶子牺牲的价值。而对于杨玉福来说，逐渐从一个平民成长为一个“中国爷们儿”，就像他的台词：“老子是爷们儿！凭啥听你摆弄啊？”和用胸膛抵住秋叶子的枪也侧面的中华民族独立精神的觉醒。最后，杨玉福拿起武器对抗日军，阻止日军杀戮平民的行为。

沃尔泽认为，国家应该尊重公民的权利，提倡自愿参军，并通过提供适当的激励措施来促进理性且公平的兵役制度。这种观点强调了个人自由意志的重要性，即个体基于对国家、社会或更高理想的信仰而自愿选择为集体利益做出贡献。在这种框架下，信仰的力量是积极且建设性的，它源自个体对正义事业的认可和支持，而非外部强制。

战争伦理只是一种稀薄的价值，它更关心的是禁止而不是提倡，即更关注什么不应该做。从两部电影在战争下的人性、战争受害、战争责任与意识形态影响等多个层面的深入对比，可以看到中国电影强调正义战争理论中的正当防卫原则，批判非正义战争给无辜人民带来的苦难；日本电影则试图通过揭示战争的荒谬性和人性的复杂性，探讨战争责任

的问题，并寻求一种面向未来的和平路径。这种差异不仅仅是艺术风格上的区别，更是两国对待历史责任的态度及其处理方式上的深层次反映。《紫日》中跨越仇恨的人性光芒，《在飘扬的军旗下》里普通百姓承受的无尽苦难，均指向了一个更为宏大的主题——那就是战争是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根本否定。珍视和平不仅仅是为了缅怀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的世界秩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持久和平与发展，让未来世代免受战争之苦，享受安宁美好的生活。

参考文献

- [1] 胡雨晴.日本反战电影研究[D].武汉大学,2020.
- [2] 胡新颖.从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看美国文化及价值观[J].文学界(理论版),2011(11):185-186.
- [3] [美]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任辉献.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41-43.
- [4] 同[3]59-60.
- [5] 陆嘉宁.银幕上的昭和:日本电影的二战创伤叙事[M].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
- [6] 干瑞青.反战与否:简论日本二战电影塑造战争记忆的方式[J].艺苑,2016(04):41-43.